

今年春晚舞台上,机器人与舞者共同扭秧歌的场景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身着红色大花袄、手拿小手绢的机器人,在欢快的背景音乐中旋转跳跃,动作精准流畅。这是一场机械与人类合作的表演,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,也是对未来技术的一次大胆展望。

舞台上的机器人成了科技进步的缩影,也让我开始思索:它们真的仅仅是舞台上的陪衬吗?它们是否有一天会超越这个角色,走出舞台,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,甚至触及那些曾经认为专属于人类的领域?

这种思考并非毫无依据,人工智能已经悄然渗透进人类生活。尤其是在文学创作领域,AI的能力更是让人不得不考虑是否要重新定义“创作者”的定语。以最近非常火爆的AI写作工具DeepSeek为例,它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生成逻辑清晰、语言流畅的文章,还能模仿经典作家的文风,甚至根据一些关键词即可构建出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。技术的突破带来高效与便利,也引发许多人的担忧:文学是否还是人类独有的产物?机器人和人工智

能是否会取代作家,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?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。回到春晚舞台上的机器人,它们的舞步没有记忆,也没有情感,它们仅仅完成了编程设定的动作。从技术层面看,这些动作无可挑剔,但它们没有对“过年”和“团聚”这些文化符号的深刻理解,与真正的表演者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情感空白。

文学也是如此。AI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风格,但它无法通过文字传递灵魂的重量。文学的本质不在于精准的表达,而在于个体经验的延展。鲁迅笔下《故乡》的凄凉与乡愁,卡夫卡《变形记》中荒诞背后的深刻孤独,都源于作家生命中的困顿、挣扎与思索。技术无法赋予文字这种复杂的情感,也不能取代作家用思想穿透生活的能力。

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文本,它承载的是人类独有的思辨与超越。作家之所以能够创造经典,不在于词句的编排,而在于他们通过文字延展出的真实生命感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AI生成的内容缺乏原创的深度,它无法理解痛苦的复杂性,也无法在矛盾中寻找出独特

的答案,它的作品是规则与算法的产物,而非思想与情感的交织。

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科技在文学领域的意义,相反,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取代,而在于补充。春晚舞台上的机器人没有掩盖人类表演者的光芒,反而通过技术的表现力增添了艺术的多样性。同样,AI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也不应被视为威胁,而是扩展人类表达边界的一种工具。通过AI,作家可以在更广阔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创作,可以从大量数据中获取灵感,也可以用技术手段探索新的叙事方式。但无论工具多么先进,赋予作品生命力的,始终是人类的情感与思想。

文学的价值从未因效率的提升而改变。文学是人类情感的镜面,是对世界的凝视与思索,在这个过程中,人类依然是唯一能够赋予文字深度的主体。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命本质复杂而矛盾,充满了痛苦、希望和意义的追寻,而这些恰恰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

节日里,我和家人围坐在一起,享受着团圆的温暖。舅舅75岁了,依然



潮涌神州

(中国画) 李采姣

精神矍铄,提起去年的旅游,他笑着说:“你们知道吗?我住的酒店都是机器人送外卖。”我们都看着他,舅舅继续说道:“这些机器人不仅负责送餐,还能打扫房间,甚至会给客人办理入住,真的是新奇的体验。”

这个场景让我意识到,科技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,也正在重塑人类对“劳动”和“创造”的理解。七十多岁的舅舅讨论机器人,他们这一代人也在与时俱进,甚至在未来科技亲密接触。机器人已经从遥远的科幻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,甚至进入了我们的日常对话和思考中。

从机器人扭起的秧歌到作家笔下的世界,科技与艺术的交汇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可能性。机器人跳舞的春天已经到来。但我相信,在这场共舞中,真正赋予世界温度的,仍然是人类的心跳。



2023年10月2日下午,我骑车去吴中路收书,陈先生前几天和朋友来考察书店,想确认犀牛书店是否值得他托付自己的藏书。当天眼见实物,确实很赞,有喜闻乐见的版本书话,古典文学以及装帧漂亮典雅的精装书。

这些书暂存在他姐家很长时间。陈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复旦大学毕业,去了德国,经营西洋珍本书。我问他可有收到过中国的古籍善本,他说很少能见到,只收过一部清内府皇绶装帧的古籍。

一个月后,我按照约定去往浦东成山路收书,是一些旧平装的文学书。在整理估价时和C先生闲聊,他谈起两位大学室友都是资深书迷,一位毕业后去了出版社工作,现在还在不停地买书;另一位则去了德国,在慕尼黑开旧书店。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穿过我的身体。不会这么巧吧?我立马追问,是陈先生吗?他也惊讶,你认识他?我说他上个月回国,就是我去他家收了旧藏。之前陪他来书店考察的应该就是你那位在出版社

夜里。上海三月头里的阴丝天,觉着冷。弄堂上铁门,加锁。过街楼下面摆裁缝摊的杨格里,手上也有一把钥匙。有人过来,叫“杨格里”;那人被叫作“张格里”。六十岁出头,都是上海爷叔,从小叫到大。长远不见,两人就在弄堂口立一歇,吃根香烟。张格里讲,夜里电视里的电影频道放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。杨格里的裁缝摊,早先是煤饼炉子,烧熨斗;后来居委会同意,拉一根电线,杨格里就用上电熨斗;再后来,接上电灯泡,又搬来一只九英寸黑白电视机,一只可以热饭的微波炉,杨格里就整日缩身于裁缝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TVB的对白听得烂熟于心——“呐,做人呢,最要紧的就是开心……”那时候,张格里没少过来蹭饭,还看白戏。

“前几年,中国人的医疗专家组到过塞尔维亚。帮了把兄弟。”杨格里说。“萨拉热窝是波黑首都—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。”张格里来一句波黑全称,杨格里有点被闷牢。“跟塞尔维亚不搭界的。”“搭界的。”杨格里讲。“都是巴尔干,以前的南联盟。再以前,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。”杨格里也来一句南斯拉夫全称。

这俩爷叔,常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。闲时,聊国家大事、世界大事。几十年来,就有这点兴趣爱好。还有便是抽烟。张格里索性跟进铺子,杨格里开电视机,张格里就摸香烟。杨格里说,抽烟到外面去,上海室内禁烟。张格里就退到门外,身子斜靠在门边,接一根烟,一边阴阳怪气,你这只小摊头,也算室内。杨格里说,不管的。杨格里抽烟,曾经恣意,香烟屁股扔地上,踏一脚。本来就是弄堂口。早先隔壁还有小便池。后来有女人来做衣裳,坐一歇,说这里香烟味道重。杨格里听进去了。从此抽烟也要出去,立在马路边,顺带望一眼野眼。

杨格里在凳子上坐定,还有点冷茶,喝一口。老裁缝的台面上,总会放一杯水,烫衣裳,就着水杯,含一口,嘎地往衣裳上喷。常年这样,口中津液流失,人就

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,李经中在江汉平原生长与生活的父母一生信奉着这样的生产方式,他们是千百年来自农村社会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生活的传承者。

在《父母的两个世界》这本回忆录式的散文集中,李经中以“我”的视角,结合自身从农村到城市的真切体验,复现父母的平凡人生与他们从农

村到城市的转变。十四篇质朴而又情感真挚的散文,从父母和我、父亲和他的大家庭、母亲和她的大家庭、父母在湖北老家的生活等角度,重现了熟人社会大家庭的互帮互助、互敬互爱的温情,这良好家风浸润在“我”的一生中。从父母来到上海生活的角度,“我”再现了他们从

精瘦。老法讲——大菜师傅胖,裁缝师傅瘦。“中国人硬杠。”杨格里有茶吃,闲话多起来,“那时候,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,就去帮人家。中国人实骨挺硬。”

张格里讲:“老底子,毛主席有一句话——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,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——这种话,讲出来,全世界买账。帮越南人的辰光,中国人其实自己也在过着紧日子。那时候,我在邮政机械厂上班,天天装配520车床。那时候的钳工生活挺括,用铲刀在新车床上手工挑燕子花。啥叫‘520’车床,就是来源于毛主席的‘520声明’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这句话,不是在‘520声明’里讲的。”裁缝杨格里没有技工生活,不懂“520”车床,但“520声明”一清二楚。这两句话,是1967年12月20日,毛主席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贺电里说的两句话。杨格里继续——“520声明”是1970年5月廿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发表的。是说这两句话的后头三年。那个年代,北越、南越分治。这封电报是打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。越南南方还有一个外交部长,是女的,叫阮氏萍。

杨格里将这一段历史知识与张格里分享;层层递进。张格里不响。“你再想想,抗美援朝,中国人刚刚过第一个国庆节,美国人打到家门口,硬着头皮也要上的。”杨格里扯得有点远。俩爷叔就讲38军和彭德怀的故事。居然还记得彭德怀致电38军的嘉奖令——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: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。三十八军万岁。

又讲了半个钟头,多吃了三五根香烟。念头过足。老爷叔硬气起来。电视里,真假瓦尔特差不多弄清楚了。收摊。杨格里锁好弄堂门。十字路口,一个往东,一个往南。张格里趁着人行道绿灯,快步穿马路过去;杨格里等红灯翻绿,立定在上街沿,信号灯上的阿拉伯数字倒计时:8、7、6、5……

农村进入城市后,面对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医等方面的文化与观念障碍等,通过认同、放弃、保留以及积极主动的融入,实现了转变。这些琐碎的人生故事提醒我们:父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平凡而温情地活着。

家门口有大河——淀浦河,河边一排垂柳,时过惊蛰,和风剪出的柳芽嫩嫩的,始鹅黄,一两天淡绿,三四天苍翠,五六天柳色满天,燕子竞相追逐嬉闹来了。

傍河而建的朱家角古镇市民广场,草长莺飞,纸鸢窜天猴似的往蓝天上钻,放飞的孩童在草地上跑得欢,红扑扑的脸蛋上挂着晶莹的汗珠,一旁的大人连声喊:“小心,别摔着!”可谁还会理睬呢。

在暖暖的春风中,广场边的垂柳呈现出绝胜烟柳的韵味。在江南人的心目中,柳树与春天是一个意思,河边垂柳摇曳身姿,万千柳丝撩拨春水。

垂柳,中国已种植四千多年,易成活,易识别。世上柳树520余种,中国约有一半。因柳和“留”同音,古人常以柳赠友,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。千百年来,垂柳也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,以柳入题,歌咏不绝。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中,《小雅·采薇》篇有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唐以后,咏柳的诗词名篇迭出,晏殊曾道:“梨花院落溶溶月,柳絮池塘淡淡风。”简笔两旬便勾画出一幅美丽的风抚垂柳、湖边月色的景致。

从古至今,爱柳之人一直未绝。我醉心的咏柳诗词,要数唐代贺知章的《咏柳》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王之涣在《凉州词》中则表达出另外一种情话: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陶渊明因爱柳,特意在堂前栽了五棵柳树,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蒲松龄临泉卜居,在泉边栽柳,便自称“柳泉居士”。清末名将左宗棠,出征西北时,命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种柳,长达数千里,人称“左公柳”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也特别爱柳,他的书房叫“寒柳堂”,其著述编为《寒柳堂集》。垂柳的千种风姿、万种风情,让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倒,在人们的心中,垂柳早就不单单是一种植物了。垂柳代表着很多美好的事物。当年

柳色青青染烟雨

管苏清

御花园,称聚景园,南起杭州旧城清波门外,北至涌金门下,东倚城垣,西临西湖,还包括了接近湖岸的若干洲渚,布局开朗、清新、雅丽。柳丛衬托着紫楠、雪松、碧桃、海棠等异木名花,是欣赏西子浓妆淡抹的观景佳地,临水眺望,视野开阔,空气清新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张岱在《西湖梦寻》中描写此园中的柳洲亭:“柳洲亭,宋初为丰乐楼。高宗移汴民居地嘉、湖诸郡,时岁丰稔,建此楼以与民同乐,故名。门以左,孙东瀛建问水亭。高柳长堤,楼船画舫会合亭前,雁次相缀。”西湖的垂柳,属稀有品种节节垂,低垂青丝,如少女想着心事,柳丝纤细风中飘动,似贵妃醉酒,远眺又像少女湖水旁浣纱漂洗。百柳成行,千柳成烟,细柳丝绦其间黄莺飞舞,竞相啼鸣,形成了真正具有神韵的“柳浪闻莺”。如今,沿湖长达千米的堤岸路途,柳色仍青翠,莺鸣亦婉转。

还记得游走济南,深深被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独特风光所打动。大明湖垂柳,令人惊诧,是我见过最高大的柳树,高达三十米左右,树身如巨桶,枝条三四米长,柔软下垂,随风飘舞,姿态优美潇洒。拍了不少照片,在垂柳树下的酒店,大碗喝酒,好不痛快!

歇笔四望,窗外传来阵阵鸟语,清脆悦耳。我懂它们的对话内容,从音调音色上分辨,它们很开心。远处的布谷鸟,一阵急过一声的“布谷谷—布谷谷”,听着催催人,不负韶光,此刻的天空下,最自由的的就是长着一对翅膀的它们,或轻盈地掠过湖面,捕上一条小鱼,回巢享受;或占据枝头,不管人们爱听不听,它们只顾自说自话。饿了,一个凌空腾飞,去树丛中逮条虫子,吃饱了继续对唱情歌。柳色正浓,我想人类欲飞翔,也得有一对“翅膀”。那是怎样的“翅膀”呢?



父母的两个世界

丽英

父母在湖北老家的生活等角度,重现了熟人社会大家庭的互帮互助、互敬互爱的温情,这良好家风浸润在“我”的一生中。从父母来到上海生活的角度,“我”再现了他们从

“书”途同归,说彼平生

庄见果

要处理。于是上门收购,尽是文学书。其中有一册是作家刘苇送给他的《四月的奥德赛》,翻开书页,只见空白处几乎写满了笔记。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,他和杨宏声于2013年先后病逝。我曾在书店和他们有过数面之缘,见到这本书,好像看到他们站在一起跟我打招呼:嗨,小庄,别来无恙啊。我本该珍藏这本书的。可惜阴差阳错,因为沟通的疏忽,书店同事将这本书上架了,并且很快就被一位女生买走。起初我有点儿

生气,但后来也释怀了。我珍视它,是因为书见证着昔日的友情;而她买走它,是真心喜欢这本书,喜欢泛黄书页上手写的笔记,她的喜爱似乎比我更纯粹。这或许正是旧书让人着迷的地方,旧书不单纯是一本旧了的书,因为和人相伴,会沾上人的气息,而这气息是独一无二的幽微真实的生命。而旧书店存在的意义,不正是在让旧书流转至喜爱它的人手中,在新的生活中焕发发生机么?

再想想,此刻在书店书架上站立的书的前主人,仅我所知的,便有好些是朋友。仅他们久不联络,但是他们的藏书还一起在书店里待着,或许在深夜无人时,它们还会在书架上蹁着二郎腿,说起自己第一次、第二次被人买走时的情景,聊起它们的前主人聚在一起时是如何谈论它们的。安得促席,说彼平生。这部完整的旧谱雕版新作再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优雅风情。请看明日专栏。责编:郭影